

## 《澳門研究》與澳門學術發展\*

陳 杰

**[摘 要]** 《澳門研究》作為由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合作編輯出版的學術刊物，創刊以來，刊登了在澳門史、澳門經濟問題、澳門政治問題、澳門法律問題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上的大量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從一個側面展現了澳門學術在回歸前後的發展歷程和重大進展，也充分說明了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在構建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拓寬澳門學術的國際視野、塑造澳門學術的風格和特色等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 澳門基金會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澳門研究》 澳門 學術發展

雖然關於澳門是否是“文化沙漠”這一問題一直存在爭議，但這一標識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其學理化、規範化、體系化的人文社會科學元素的長期缺乏。然而，伴隨着20世紀末中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的重大政治轉型，澳門社會各界在強烈的回歸熱情驅動下，通過多樣化的方式，使得這種局面得到了極大改觀。

1987年4月13日，《中葡聯合聲明》及其附件正式簽署。1988年1月15日，《中葡聯合聲明》及其附件換文生效。至此，澳門正式進入了為期12年的過渡時期。為使澳門回歸祖國後繼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過渡時期內，澳門社會各界亟需圍繞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化這三大任務奠定“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和澳門特區政府行使高度自治權的政治基礎、組織基礎和文化基礎。為“立足澳門，研究澳門社會，為澳門的安定、繁榮和發展服務”，<sup>①</sup>1987年6月1日，在《中葡聯合聲明》及其附件正式簽署僅兩個月後，當時的東亞大學（即現時的澳門大學）迅即成立澳門研究所，<sup>②</sup>並於1988年6月22日創辦學報《澳門研究》。1988年2月29日，澳門行政當局核准澳門基金會新章程，原本傾向於慈善事業的澳門基金會開始“追從文化及教育性質之目標、鼓勵科學研究、特別是有關東亞大學的行政及保障學術獨立”、“俾能全面實現支持本地區

**作者簡介：**陳杰，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872

\* 本文係澳門基金會出資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① 林達光：《發刊辭》，《澳門研究》（澳門）1988年創刊號。

② “私立東亞大學，於1981年成立，為澳門首間現代高等教育學府。1988年由政府收購後改為公立大學，並於1991年制定大學章程，東亞大學更名為澳門大學”，是時，澳門研究所亦更名為澳門研究中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https://www.gaes.gov.mo/images/hemag/images/books/book8/pdf/12-61.pdf>。

文化發展的主要目的，以及培訓負責澳門前途的新一代”。<sup>①</sup> 這說明，在此一時期，以澳門基金會和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現為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為代表的研究機構和研究者因應了時代要求，正式開始探索澳門問題研究和澳門學術發展之路。1993年2月，為進一步“回應本澳社會發展的需要，更好地利用雙方的資源，更有成效地開展、組織與推動學術活動”，<sup>②</sup> 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決定加強合作、聯合編輯出版一度停刊的《澳門研究》，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針對澳門問題各領域展開深入、規範和系統的研究，其目的在於推動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構建澳門本土的學術規範與話語體系。至此，《澳門研究》重新擔起其“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的使命，在逐步成長為澳門問題研究領域標誌性刊物的過程中，也為推動澳門學術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不容忽視的貢獻。

截至當前，《澳門研究》編輯出版共計91期；文章主題涵蓋歷史、經濟、政治、法律、社會、文學、藝術、宗教、哲學、教育等諸多領域；文章的學術規範不斷提高、資料支撐越加翔實、研究方法與時俱進、研究內容不斷拓展。從時間上看，《澳門研究》與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等澳門本地學術機構和隊伍的成立、發展和壯大歷程大體契合；從內容上看，《澳門研究》所刊登的文章，涉及的研究主題極為廣泛，幾乎涵蓋了人文社會科學的所有學科門類，同時也包括一些澳門地理和澳門生態的研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澳門研究》成長為澳門研究領域的一本學術名刊的歷程，也是以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為代表的研究機構和研究者推動澳門學術發展的一個縮影。在《澳門研究》的“而立之年”，考察這三十年來的學術史演進歷程，對於認識回歸前後澳門問題研究的整體狀況，理解以《澳門研究》、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為代表的研究機構和研究者在構建澳門人文社會科學體系、推動澳門學術發展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具有重要作用。

## 一、關於澳門史的研究

在《澳門研究》形成的眾多研究成果中，澳門史研究成果尤為豐碩，是最為主要的研究領域。以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等一批18世紀末、19世紀的著作為標誌，澳門史研究的起步發軔於19世紀，中葡兩國關於澳門主權歸屬問題的爭議，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存在較為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討論較為偏頗，有一些方面客觀理性不足。隨着澳門主權歸屬問題的解決，澳門史研究理應逐步回歸客觀理性並聚焦到澳門社會內部，這是深化澳門史研究、書寫一部為較為完善的澳門通史的客觀需要。在此背景下，《澳門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專題研究，具體包括：澳門史料學、澳門歷史地理考證、澳門國際關係史、澳門專門史、與澳門相關的歷史人物研究，等等。

在澳門史料學研究方面，《澳門研究》作為一個匯聚澳門及海內外學者、就澳門問題研究進行思想交鋒和學術爭鳴的平台，不可能從事諸如歷史文獻資料的搜集與整理這類規模浩大的基礎

<sup>①</sup>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印務局：《澳門政府公報》1988年2月1日，<http://www.io.gov.mo>。

<sup>②</sup> 《復刊詞》，《澳門研究》（澳門）1993年第1期。

性工作，<sup>①</sup>而只可能對史料的內在特性進行探索。例如，有一些是專門對某些史料的學術價值進行考察和評估，<sup>②</sup>有一些主要是對某些史料的內容進行全面介紹，<sup>③</sup>有一些是對某些史料的來源進行考證，<sup>④</sup>還有一些則是介紹某些機構的館藏澳門文獻史料，以方便研究者的查閱和使用。<sup>⑤</sup>可見，這些細緻的史料介紹、評估與考證工作與宏大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完整意義上的澳門史料學。此外，這也從一個側面明確指明澳門史研究所必須依循的路向，即澳門史研究必須建立在全面扎實的史料基礎之上，這既體現了1990年代以來澳門史研究水平的提升，也指引着今後澳門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在澳門歷史地理考證方面，《澳門研究》的澳門史研究者們對歷史上與澳門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一些史料、史事的考證極為重視，形成了一批頗具價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以金國平、吳志良、黃鴻釗和湯開建等學者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例如，有對於澳門史料文獻的考證，<sup>⑥</sup>有對於“澳門”起源及其詞源的考證，<sup>⑦</sup>有對於澳門早期開埠史的考證，<sup>⑧</sup>有對於政治組織、慈善組織、教會組織等澳門社會內部諸要素的考證，<sup>⑨</sup>但更多的還是立足於澳門的中西經濟、文化樞紐

- ① 1990年代以來，澳門基金會發起史料“出版運動”，一大批中國內地、澳門本地、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檔案文獻資料得以蒐集、整理並出版，澳門史料學的基礎性工作主要是由一大批關心澳門問題研究的機構和學者在這一階段合力完成的。詳見金國平：《特區成立五年來澳門史地研究之回顧與展望》，《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1期；劉澤生：《回歸十年澳門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以澳門歷史研究為中心》，《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1期。
- ② 韋慶遠：《〈澳門專檔〉的重要學術價值》，《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6期；湯開建、趙殿紅：《委黎多〈報效始末疏〉——一份新發現的澳門早期歷史文獻》，《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1期；董少新：《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藏〈耶穌會士在亞洲〉評介》，《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4期；湯開建：《道光七年〈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4期。
- ③ 湯開建、張坤：《兩廣總督張鏡心〈雲隱堂文錄〉中保存的崇禎末年澳門資料》，《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4期；Paul A. Van Dyk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Macau, Cant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1700–1842,” 《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6期；[美]利亞姆·布洛基：《隱匿的澳門史料：耶穌會年報》，陳玉芳譯，《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4期；湯開建：《明韶州同知劉承範〈利瑪傳〉的發現、內容及價值》，《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第4期。
- ④ [澳大利亞]Geoffrey C. Gunn：《戰時澳門文獻——來源與解讀》，貢曉靜譯，《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4期。
- ⑤ 湯開建：《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乾嘉道時期美國與澳門關係之中文檔案釋文》，《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2期；李麗青：《英國藏澳門歷史文獻概述》，《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4期；倪俊明：《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澳門文獻概述》，《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2期。
- ⑥ 金國平、吳志良：《流散於葡萄牙的明清瓷器》，《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1期；金國平：《〈依溼雜說〉疑存析》，《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第1期；金國平：《澳門歷史學家裘昔司之生平及著作考述》，《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4期。
- ⑦ 鄧景濱：《澳門外文稱謂Macao非借用於緬甸》，《澳門研究》（澳門）2000年第1期；施存龍：《澳門真正乳名為蠓鏡澳——聞一多〈七子之歌〉考正》，《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5期；吳志良、金國平：《從葡、西早期檔案資料探究“澳門”各種書寫形式的嬗變》，《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3期；金國平：《“洋船灣”與“洋環”考》，《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3期；周振鶴、林宏：《早期西方地圖中澳門地名與標注方位的謎團》，《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3期。
- ⑧ 黃啟臣、鄧開頌：《澳門港的興起、發展與衰微》，《澳門研究》（澳門）1988年創刊號；金國平：《葡萄牙人在澳門半島“漸運甌甓椽檣為屋”之過程》，《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4期；徐曉望：《關於澳門開港與媽閣廟起源的再認識》，《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2期。
- ⑨ 金國平：《葉權所描述澳門教堂考》（澳門）2012年第2期；金國平：《葡人眼中的同善堂》，《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4期；湯開建：《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1583—1865）》，《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2期。

之地位來考察早期中葡關係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宗教傳播史。<sup>①</sup>由此可見，《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對於澳門歷史地理的考證主題涉及澳門的史料學、政治史、對外貿易史、文化交流史、社會史等領域，正是這些眾多而紛雜的歷史文化元素賦予了澳門這一“彈丸之地”不可或缺、獨一無二的特殊性。以《澳門研究》為基地形成的一批澳門歷史地理考證成果，以及由此興起的澳門史研究領域的考證之風，對於改善澳門回歸祖國之前深受政治因素和民族主義情緒影響的澳門史研究局面、推動澳門史研究回歸客觀理性的學術環境、填補既有研究的疏漏之處乃至匡正其錯訛之處、還原澳門歷史原貌並建構起一部較為完善的澳門通史，無疑發揮了極為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在澳門的國際關係史研究方面，澳門作為在厲行海禁的明清時期南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曾是中西方乃至是西方與遠東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交流的樞紐站與橋頭堡，這不可避免地將澳門置身於一種複雜的國際關係之中，並最終將其塑造成為一個超越狹小地理範圍的國際文化符號。因此，金國平、吳志良等澳門史學者歷來主張在中國、世界這一宏大視野中來研究澳門史，而不可僅僅局限於香山或嶺南地區，只有這樣，澳門的歷史價值和意義才能準確地彰顯出來。<sup>②</sup>正是在這種史觀的指導下，澳門國際關係史研究在1990年代以來湧現了大量研究成果。<sup>③</sup>在中葡關係史研究方面，葡萄牙據居、侵佔澳門長達400餘年，是與澳門淵源最深的西方國家，且在18世紀以來，中葡兩國關於澳門的主權與治權問題的爭論就一直存在，所以，澳門史中關於明清政府對葡政策、葡人據居澳門的歷史過程、澳門主權、中葡戰爭、中葡交涉、澳門劃界等中葡關係史的相關問題研究相當豐富，<sup>④</sup>這些研究對於揭示明清時期的中葡關係的重大歷史議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英關係史研究方面，鴉片戰爭之前，英國一度想攫取澳門作為殖民

- ① 金國平：《從Chapa da Prata到Chapa da Ouro》，《澳門研究》（澳門）1999年第1期；施存龍：《葡人“漳州失守”說考辨——與施白蒂〈澳門編年史〉對話》，《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3期；金國平、吳志良：《誰是中國第一位天主教徒》，《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6期；金國平：《“佛郎機牙”及“裏海牙”考源》，《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6期；黃鴻釗：《鄭瑪諾與近代出洋留學的起源》，《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6期；貝武權：《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居留地——雙嶼“Liampo”考》，《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2期；周運中：《玄雲島故事所見的晚期雙嶼港》，《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3期。
- ② 吳志良：《悅讀澳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63頁。
- ③ 此處的國際關係史研究僅指中國政府和其他國家政府之間有關外事訪問、外交談判、軍事戰爭等政治關係史的研究，不包括中國政府與民間和其他國家政府與民間的經濟貿易、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等非政治關係史的研究，此部分研究將在後文專門予以介紹。
- ④ 吳志良：《葡人據居澳門的過程》，《澳門研究》（澳門）1996年第5期；施存龍：《葡人在福建活動地Chincheo重考》，《澳門研究》（澳門）2003年第4期；黃鴻釗：《香山與澳門劃界爭端始末》，《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3期；黃鴻釗：《赫德與1887年中葡條約》，《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4期；施存龍：《中葡走馬溪之役考辨》，《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4期；戚印平：《16世紀葡、西兩國武力征服中國的計劃及其相關問題》，《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6期；查燦長：《鴉片戰爭前後澳門生存路徑的選擇》，《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6期；黃鴻釗：《有關抗日戰爭勝利後收回澳門的問題》，《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1期；黃鴻釗：《鴉片戰爭後澳門地位的變化》，《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6期；金國平：《葡萄牙人在澳門半島“漸運瓊甌棧枵為屋”之過程》，《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4期；馬建春：《葡萄牙首次入貢明朝與回回人的作用》，《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2期；葉農、歐陽開方：《晚清中葡交涉中的土地糾紛問題——以〈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為中心》，《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2期；劉勇：《1772年珠江口岸“更新者號”事件引發的葡—荷—中衝突》，《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3期；何志輝：《鴉片戰爭前後的時局與澳門》，《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3期；湯開建：《明朝野士人對澳門葡人的態度、策略及流變》，《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3期；譚群玉：《態度與技巧——岑春煊的涉澳外交活動》，《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3期；莫世祥：《抗戰時期的中葡交涉——蔣介石與國府高層處理澳門事項的內幕透視》，《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4期；何志輝：《葡萄牙憲法的演變與近代澳門地位問題的產生》，《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4期；吳宏岐：《嘉靖四十三年“三門之役”之具體戰場考實》，《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3期。

地未果，後借機發動鴉片戰爭迫使清政府割讓香港並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五個港口城市，自此澳門開始喪失在遠東地區的貿易壟斷地位，所以，澳門史中關於鴉片戰爭、中英戰爭等中英關係史的研究成果也必不可少。<sup>①</sup>在明清史研究方面，毋庸置疑，澳門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歸香山縣管轄，澳門史研究應該在堅持“中國史觀”的前提下加強明清史的研究，與此同時，西方的商人、傳教士等人在明清時期紛紛來華，中國在閉關鎖國的同時也在被動地面對着“全球化”萌芽的歷史潮流，故而，明清史研究也應在堅持“全球史觀”的前提下充分評價澳門在當時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澳門史研究中關於明清史、粵澳關係史的研究亦不在少數。<sup>②</sup>除此之外，日本作為西方傳教士與殖民者在遠東地區進行傳教和殖民貿易的目的地之一，荷蘭、法國、美國都相繼在傳教和對外貿易過程中與澳門建立起密切的宗教關係和經濟關係，因此，近幾年來，關於中（澳）日關係史、中（澳）美關係史、中（澳）荷關係史、中（澳）法關係史的相關研究也不在少數。<sup>③</sup>由此可見，《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在澳門的國際關係史研究方面，以中葡關係史的研究為重心，同時輻射明清史、粵澳關係史、中日關係史、中美關係史、中荷關係史的研究，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這為推動澳門史以及明清時期中外關係史研究的進步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貢獻。

- ① 張運華：《論19世紀40年代前期英國對澳門的幾次主要侵略活動》，《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3期；鄭光濱：《清朝中葉澳門成為西方侵華跳板及中西聯繫紐帶——兼論鴉片戰爭與澳門》（上），《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3期；鄭光濱：《清朝中葉澳門成為西方侵華跳板及中西聯繫紐帶——兼論鴉片戰爭與澳門》（下），《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4期；張坤：《澳門的英商郵政與鴉片戰爭前的中英關係》，《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1期；吳宏岐：《中英澳門開關戰事之真相》，《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5期。
- ② 金國平、吳志良：《鄭和航海的終極點——比刺及孫刺考》，《澳門研究》（澳門）2003年第3期；湯開建、吳青：《萬曆四十八年紅夷船沉陽江始末考——兼談紅夷大炮早期入華問題》，《澳門研究》（澳門）2003年第4期；金國平：《鄭和研究若干相關問題》，《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2期；[日]桑田六郎：《關於鄭和》，《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5期；金國平、吳志良：《500年前鄭和研究一瞥——兼論葡萄牙史書對下西洋中止原因的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1期；金國平、吳志良：《努爾哈赤死因真相新證》，《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2期；金國平、葉建源：《從葡萄牙史料看鄭和船隊洲際三角貿易形態》，《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3期；金國平、吳志良：《〈鄭和航海圖〉二“官廠”考》，《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5期；吳志良、金國平：《西方文獻對雍正繼位的記載》，《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4期；余果：《淺談鄭和下西洋活動中的幾個經濟元素》，《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4期；江智猛：《明代月港興起與海上貿易》，《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第2期；戴建兵：《海上絲銀之路貿易中的爛板銀元及對中國貨幣金融的影響》，《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3期；韋慶遠：《有關粵澳關係史研究的若干問題——對鄧開頌、吳志良、陸曉敏主編〈粵澳關係史〉的評介》，《澳門研究》（澳門）1999年第1期；孫關龍：《嶺南——中國和世界海洋商貿文化的重要基地》，《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2期；湯開建：《清代香山鐵城張氏家族與澳門的關係——以〈曲江張氏族譜香山鐵城宗支譜〉為中心展開》，《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第1期。
- ③ [日]宜野座伸治：《太平洋戰爭時期的澳日關係》，《澳門研究》（澳門）1996年第5期；孔穎：《日本天正遣歐使團與澳門》，《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1期；孔穎：《澳門與1837年馬禮遜號事件》，《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4期；徐藍：《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的美國與澳門關係》，《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2期；何思兵：《早期澳門的美國商人社區與十九世紀美國對華政策的形成》，《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2期；湯開建：《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乾嘉道時期美國與澳門關係之中文檔案釋文》，《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2期；顧鈞：《從書信看衛三畏在澳門的活動（1835—1844）》，《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2期；湯開建、吳青：《從〈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看天啟時期荷蘭與澳門的關係》，《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5期；劉勇：《1772年珠江口岸“更新者號”事件引發的葡—荷—中衝突》，《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3期。

在澳門專門史研究方面，從本土視角出發、構建自主的歷史解釋體系關係到本國國民或本區域居民的自尊以及歸屬感，對於重構一個剛從殖民狀態走出來的新政治共同體而言極為重要。因此，將澳門史研究的聚焦點轉移到澳門內部社會演變、爭取歷史敘事及話語權的回歸一直是澳門史學界努力的方向。對此，《澳門研究》的作者們亦進行了較多探索，並取得了豐碩成果。在政治治理史方面，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明清政府對澳門的管轄、澳門葡人自治等問題上。<sup>①</sup>在經濟貿易史方面，相關研究聚焦於澳門早期博彩史、經濟組織發展史、對外貿易史等問題上。<sup>②</sup>在文化交流史方面，澳門作為東西方文化共融共生的產物，其獨特文化自然是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中產生的，因此，澳門文化史研究成果多體現為以宗教、藝術、教育、科技、醫學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相關研究成果極為豐富。<sup>③</sup>在城市發展史研究方面，無論是開埠之初、當前還是以後，合理運用澳門有限空間並保持其文化特質的城市規劃始終是極為重要的，因此，關於澳門早期城市建設、城市文化、城市擴張、城市管理等城市發展史方面的研究一直澳門史研究

- 
- ① 黃鴻釗：《澳門同知的歷史地位》，《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6期；張海珊：《明朝守澳官的行政架構及其對後世之影響》，《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1期；何志輝：《共處分治中的主導治理——論明政府對澳門的治理措施》，《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2期；余淑玲：《論鴉片戰爭以前葡國管理居澳葡人的若干法律問題》，《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1期；湯開建：《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1583—1865）》，《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2期。
- ② 趙利峰：《閩姓傳入澳門及其初期發展》，《澳門研究》（澳門）2003年第2期；黃鴻釗：《駭人聽聞的澳門苦力貿易》，《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3期；胡根：《清末澳門賭商社會活動初考》，《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6期；胡根：《公物會在澳門博彩業早期發展扮演的角色》，《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3期；臧小華：《澳門與英國商人的美洲西北岸毛皮貿易：1779—1800》，《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6期；張海珊：《晚清時期澳門博彩事業的興起及對本土文化的衝擊》，《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5期；胡根：《1872年香港禁賭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6期；張蘭星：《論十六至十七世紀的巨船貿易——以“澳門—長崎”航線為例》，《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1期；趙利峰：《民國時期的澳門跑狗事業》，《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2期；曾金蓮：《澳門商會的創辦與早期扮演的角色》，《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2期；[日]松浦章：《明末清初的澳日貿易》，陳燕虹譯、孔穎校，《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3期；張鎧：《西班牙與葡萄牙統一時期的澳門（1580—1640）》，《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4期。
- ③ 黃鴻釗：《澳門開埠與中外文化交流》，《澳門研究》（澳門）1988年創刊號；黃鴻釗：《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澳門與東西方文化交流》，《澳門研究》（澳門）1998年第1期；夏泉：《澳門聖若瑟修院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2年第1期；吳志良：《澳門與禮儀之爭：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覺》，《澳門研究》（澳門）2003年第1期；彭順生：《論穗澳在中西古代文化交流中的特定地位與不同作用》，《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3期；夏泉：《明清之際天主教會澳門創校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4期；何小蓮：《鴉片戰爭以前西醫東傳與澳門地位》，《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2期；吳志良：《香山濠鏡辨光芒——澳門與香山文化淵源探析》，《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5期；劉然玲：《論澳門文化的本土性和世俗性》，《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6期；劉然玲、匡國鑫：《關於早期澳門多元文化“遞進重構”模式》，《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3期；張建芳：《澳門廟宇文化中古代中國天文曆法知識的遺存》，《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3期；張照：《英國循道公會麥路得醫生華南醫學傳教述論》，《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6期；臧印平：《范禮安與中國——兼論中國教區與耶穌會澳門住院及聖保祿神學院的關係》，《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3期；馬錦強：《澳門出土明代青花瓷器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3期；[日]高橋強：《16、17世紀天主教日本神父培養事業及其與澳門的交流》，沈藝譯，《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4期；李丹：《晚清來華傳教士與西方經濟學的輸入》，《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2期。

的一個重要領域。<sup>①</sup>在社會史研究方面，近年來，醫療衛生事業、弱勢群體、慈善組織、華人社會等社會史上長期被遺忘的“他者”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sup>②</sup>這體現了澳門史研究程度的深化，也最能體現出澳門史研究視角基本完成了由外部向本土的轉換。在民族史研究方面，土生葡人是澳門一個不容忽視的特殊族群，關於其政治認同、地域認同、文化認同以及身份認同等民族史問題的研究也是澳門史研究一個比較關注的問題。<sup>③</sup>可見，敘事視角指向澳門社會內部的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民族史等專門史研究一直是《澳門研究》的作者們所關注的重要領域，唯有從歷史的角度全方位、立體式、深層次地釐清澳門社會的方方面面，才能建構起一部能夠喚醒澳門居民歷史認同感的澳門通史。

在與澳門相關的歷史人物研究方面，澳門雖然地域狹小，但由於其在明清時期以及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有不少對中國乃至對世界均有重大影響的知識分子、商人、傳教士、政治家和革命家都曾與澳門結下不解之緣，為這塊土地平添不少歷史的神秘感與厚重感。所以，研究與澳門有重要影響的歷史名人的活動、事跡、思想成為澳門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有對於湯顯祖（1550—1616）、吳曆（1632—1718）、庇山耶（1867—1926）等與澳門相關的知識分子的研究，<sup>④</sup>有對於盧九（1848—1907）、經元善（1840—1903）等澳門華商的研究，<sup>⑤</sup>有對於范禮安（1539—1606）、利瑪竇（1552—1610）、南懷仁（1623—1688）、馬禮遜（1782—1834）等西方傳教士的研究，<sup>⑥</sup>有對於鄭觀應（1842—1922）、康有為（1858—1927）

① 嚴忠明、葉農：《澳門葡城與葡萄牙東方建城模式》，《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2期；林發欽：《海盜曾一本犯澳與澳門城牆的首建》，《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2期；臧小華：《不自由的自由城市——從早期澳門城市制度看文化並存》，《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2期；曾金蓮：《地界之爭與城界擴張——澳門近代城市的開端（1864—1874）》，《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1期；吳玉嫻：《1760—1840：“澳門住冬”與南灣之變遷》，《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1期；陳文源：《近代澳門城市街道管理的制度與措施》，《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4期；呂澤強：《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的澳門城市現代化建設——基於澳門檔案館內城市及建築圖則的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第1期。

② 湯開建、馬根偉：《清末澳門鏡湖醫院的建立與發展》，《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6期；何偉傑：《澳門鏡湖醫院早期在慈善與商業上的行政管理》，《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3期；黃雁鴻：《澳門慈善團體的發展與社會作用》，《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2期；李立：《1895年澳門瘟疫中的社會互動》，《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2期；[葡]伊沃·卡爾內羅·德·索薩：《十八世紀澳門的孤女和婚姻市場》，田渝譯，《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2期；金國平：《葡人眼中的同善堂》，《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2期；梁佳俊：《宣講聖諭與分送善書——早期澳門同善堂的教化活動》，《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2期；張中鵬：《分化與整合：明代澳門華人社會結構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第2期；晏雪蓮：《近代澳門葡裔族群獨身現象探析》，《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2期。

③ 王國強：《澳門土生的形成與流失》，《澳門研究》（澳門）1996年第1期；廖楊：《關於澳門土生葡人的族屬與籍屬問題》，《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5期；[葡]卡洛斯·皮特拉：《澳門土生葡人的身份認同——關於澳門學的問題》，曾金蓮譯，《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4期；[葡]馬里薩·加斯帕爾：《歷史與形塑親屬關係之互動——澳門土生葡人歐亞家庭個案研究》，曾金蓮譯，《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第1期。

④ 陳業東：《庇山耶：溝通漢葡文學的先驅》，《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3期；黃鴻釗：《湯顯祖詩證澳門史》，《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2期；金國平、吳志良：《吳歷“入壘不果”隱因探究》，《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3期。

⑤ 林廣志：《晚清澳門華人巨商盧九家族事跡考述》，《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5期；金國平：《“經元善案”與鄭觀應》，《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4期。

⑥ 侯杰：《基督新教來華先驅馬禮遜和他的傳教活動——紀念馬禮遜來澳傳教200週年》，《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2期；戚印平：《范禮安與中國——兼論中國教區與耶穌會澳門住院及聖保祿神學院的關係》，《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3期；金國平：《羅明堅與利瑪竇的閩籍漢語教師試考》，《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2期；[比]高華士：《南懷仁、安文思、徐日昇與耶穌會北京西堂書院（1670—1688）》，趙殿紅譯，《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2期。

等維新派人士的研究，<sup>①</sup>也有對於孫中山（1866—1925）等相關革命黨人的研究。<sup>②</sup>可見，《澳門研究》的作者們不僅重視釐清澳門之“事”，而且也十分重視對相關歷史人物進行考察，真正做到了“人事結合”，這對於更為全面而生動地理解澳門歷史具有重要作用。

## 二、關於澳門經濟問題的研究

《澳門研究》十分關注澳門經濟的問題，相關研究成果無論是數量還是主題都頗為豐富。澳門經濟問題研究可以說是《澳門研究》創刊以來開拓的僅次於澳門史研究的另一重大領域。眾所周知，博彩業在澳門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長期以來“一業獨大”的局面使得澳門產業結構單一，從而限制了澳門經濟的抗風險能力、綜合競爭力以及可持續發展能力，因此，深入研究澳門經濟的發展模式、發展方向、發展路徑等問題就顯得十分必要且緊迫。在澳門回歸祖國以前，《澳門研究》就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並展開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三十年的探索過程中，《澳門研究》的作者們緊跟澳門經濟發展大勢，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方向由模糊到明朗、研究主題由分散到集中，逐步形成了在澳門經濟問題研究領域的三大視角：一，從宏觀視角出發探討澳門產業結構轉型、經濟適度多元化等發展模式、發展方向等問題；二，從中觀視角出發具體探討用於解決澳門產業結構轉型的、逐步突顯的“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發展方向，主要表現為對區域經濟合作、國際化的經貿服務平台建設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等經濟多元化實現路徑問題的探討；三、從微觀層面出發對博彩業、銀行業和房產建築業等傳統支柱產業，以及對會展業、製藥業、文化創意產業等新興產業進行探討。

在宏觀的經濟發展模式、發展方向研究方面，1990年，澳葡政府委託美國麥健士公司就澳門宏觀經濟規劃形成《澳門未來十年發展前景》的研究報告，表現出其對澳門經濟發展模式和路向問題的關注。在此前後，相關的社會組織、學術機構以及學者亦陸續展開對澳門產業結構轉型、經濟適度多元化等問題的研究。三十多年來，澳門經濟過度依賴博彩業的結構化問題並未得到根治，學界對於澳門產業結構轉型、經濟適度多元化等發展模式、發展方向問題的探討也從未停止。然而，同樣的問題所處的歷史語境並不相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點也不盡一致。在過渡時期內特別是1993年以後，地產建築業、出口加工業等支柱產業發展陷入持續低迷，1997年龍頭產業

- ① 尹德剛：《鄭觀應與中國近代新聞事業》，《澳門研究》（澳門）2003年第2期；盛永華、孫關龍：《鄭觀應科技興國思想初探》，《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1期；侯杰、王興昀：《〈盛世危言〉——“世居澳門”的鄭觀應向近代中國敲響警世鐘》，《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1期；李長莉：《商人思想家鄭觀應：“洋貨流行”市場分析與“商戰”思想》，《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第3期；謝放：《鄭觀應的“中體西用”思想及其影響——以〈盛世危言〉（五卷本）為中心》，《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第3期；曹天忠：《鄭觀應、盛宣懷交誼與晚清洋務實業——以漢陽鐵廠（1896—1898）為例》，《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第3期；邵建：《晚清政局下的口岸知識分子——鄭觀應及經元善的關係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2期。
- ② 孫關龍、盛永華：《孫中山的科教興國思想及其實踐》，《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4期；盛永華、孫關龍：《從民權主義看孫中山對儒教的批判——紀念孫中山誕辰140週年》，《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4期；孫關龍：《孫中山進化觀淺探》，《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5期；盛永華：《從〈上李鴻章書〉到〈實業計劃〉》，《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1期；金國平：《孫中山與澳門二題》，《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3期；金國平：《孫中山與共濟會之關係探析》，《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1期；婁勝華：《孫中山及其黨人澳門結社活動考述》，《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1期；何志輝：《澳門印痕——孫中山思想中的時空背景》，《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2期。



博彩業在亞洲金融風暴和內部治安不靖等因素的影響下也出現衰退，整個澳門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在此背景下，以《澳門研究》為平台之一，學界爭相為澳門經濟“把脈”，就澳門未來的戰略定位、產業結構、工業內部結構等問題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sup>①</sup>這些政策研究透露出學界對未來澳門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隱憂。澳門回歸祖國以後，經濟雖然在博彩業的直接帶動下出現了“恢復性增長”，但由於“賭權開放”的內部體制改革和中國內地對澳門開放“個人遊”和“自由行”的外部因素作用，博彩業出現了“井噴式”的發展和膨脹，進一步擠壓了其他產業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經濟結構單一的歷史積弊仍然未得以有效改變。為此，《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在新的歷史語境下進一步深化了對產業結構優化轉型、經濟適度多元等問題的研究，在論證新形勢下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必要性、方向、路徑、有利因素、制約因素和國際經驗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成果。<sup>②</sup>可見，無論是“九九”澳門回歸以前還是以後，《澳門研究》的作者們都在密切追蹤澳門的經濟發展大勢，在此基礎上推動和深化澳門經濟發展模式的研究。

在中觀的經濟多元化實現路徑研究方面，在20世紀90年代初社會各界開始關注澳門未來發展模式、發展方向這一宏觀問題時，除了將這一問題提上了全社會的議事日程之外，更多的是各抒己見，紛紛提出澳門經濟多元化的可行路徑。其中，建議依靠製造業的升級轉型者有之，建議着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者有之，建議建成區域性商貿服務平台者有之，建議建成國際休閒旅遊中心者有之，如此等等，見仁見智。《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在澳門回歸祖國前的這段時間裏，對該問題的研究多是提出比較寬泛的政策設想和建議，<sup>③</sup>尚不能形成實踐價值，在這種局面下，理論與現實無法形成良性互動，這可能與當時的澳葡當局由於“夕陽政府”心態作祟而“全面撒手”有關。澳門回歸祖國以後，特區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大力恢復和發展經濟，並與歐盟國家、葡語國家以及粵港等其他地方政府緊密合作，着力推動國際合作與區域合作，促進澳門的產業結構轉型。在這種背景下，《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對澳門與中國內地和國際社會經貿合作的一些重大舉措進行了深入考察和反思，從而形成了一批頗具建設意義的政策性研究成果。例如，在2003

① 黃漢強：《澳門過渡期發展經濟面對的矛盾及出路的選擇》，《澳門研究》（澳門）1988年創刊號；林士明：《過渡期澳門經濟發展需要注意的問題的探討》，《澳門研究》（澳門）1988年創刊號；蔣年雲：《澳門經濟定位的設想》，《澳門研究》（澳門）1998年第1期；閻世平：《澳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問題研究》，《澳門研究》（澳門）1998年第1期；朱國林：《澳門：作為微型經濟體的發展模式研究》，《澳門研究》（澳門）1999年第1期；馮邦彥：《澳門回歸後的經濟發展路向探討》，《澳門研究》（澳門）1999年第4期；何佳聲：《對澳門回歸後的發展路向和策略的思索》，《澳門研究》（澳門）1999年第4期。

② 吳麗燕：《關於澳門特區產業結構轉型的討論》，《澳門研究》（澳門）2003年第4期；陳章喜：《澳門產業適度多元化發展的必要性》，《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4期；翌日：《反覆強調澳門經濟必須適度多元發展何以必要》，《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5期；李曉平：《日韓產業政策的特點及對澳門的啟示》，《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5期；黃燕芬、董進修：《澳門經濟發展中產業定位問題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1期；馮邦彥：《澳門經濟發展及其適度多元化的方向》，《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6期；陳廣漢、張應武：《澳門經濟：增長特徵、隱憂與突破口》，《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6期；鄭成文：《新加坡產業發展及其對澳門的啟示》，《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2期；王永中：《澳門產業結構的存在問題及其改進方向》，《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3期；楊麗：《澳門博彩業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現狀分析及政策建議》，《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3期；曠婷玥：《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實施路徑》，《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3期；潘圓圓：《國際經驗對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啟示》，《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3期；李建民：《澳門經濟的發展機遇與戰略選擇》，《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2期；章海源：《新形勢下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3期。

③ 經濟多元化實現路徑的研究成果多散佈於經濟發展模式、發展方向的相關研究之中，尚未形成大規模的專題研究。

年10月17日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簽署《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的背景下，《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對CEPA啟動後珠三角地區區域合作的前景、澳門的地位與對策、效果等問題進行了持續的考察。<sup>①</sup>又例如，對珠澳、粵澳、粵港澳、澳門與大珠三角、澳門與泛珠三角這些由近及遠的區域性經貿合作進行了全面的考察。<sup>②</sup>再如，2008年1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頒佈《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提出粵澳聯合開發橫琴島並將澳門建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設想，在此背景下，《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對橫琴新區開發的示範意義、理論問題、現實問題以及對澳門的意義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sup>③</sup>對“世界休閒旅遊中心”的概念、要素、具體建設措施進行了跟蹤研究。<sup>④</sup>例如，在2009年12月15日港珠澳大橋從設想邁向現實、正式開工建設的背景下，《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對粵港澳合作的這一標誌性基礎設施可能對澳門產生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考察。<sup>⑤</sup>又如，在2003年10月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在澳門成立的背景下，《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對澳門在中國與葡語

- ① 左連村：《CEPA框架下粵港澳區域經濟的整合與輻射》，《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1期；宋小莊：《CEPA啟動區域合作的前景》，《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1期；高巍：《CEPA啟動後的大珠江三角洲經濟融合》，《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1期；馮邦彥：《CEPA：澳門與珠三角經濟整合的“引擎”》，《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1期；周運源：《論澳門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因應對策》，《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1期；劉毅：《CEPA十年效應：港澳比較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4期；馮邦彥、彭薇：《CEPA實施、服務貿易自由化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4期；李嘉曾：《CEPA精神與“粵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4期；陳章喜：《CEPA與澳門高端服務業的發展》，《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4期。
- ② 黃漢強：《大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與澳門競爭力》，《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1期；黃漢強：《“泛珠三角”經濟區的構建與澳門的角色》，《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4期；封小雲、楊道匡：《澳門在大珠三角區域一體化中的地位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1期；周運源：《WTO機制下澳門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的發展》，《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1期；周運源：《務實合作基礎，創新合作模式——新時期深化澳珠聯繫合作之管見》，《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2期；楊宜勇、周帥：《促進澳珠經濟一體化的組織問題》，《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4期；陳青：《雙子城——新世紀澳珠區域合作的終極目標》，《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4期；鄭華峰：《關於粵港澳經濟融合的若干思考與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1期；葉桂平：《現階段湘澳經貿合作中的澳門平台作用芻議》，《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3期；吳崇伯：《閩澳經濟合作發展與對策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1期；韓江波：《珠澳協同發展：現實基礎及實現路徑——以兼論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戰略定位》，《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3期。
- ③ 鄭偉聰：《尋找橫琴開發的利益契合點》，《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1期；黃燕芬、陳麗娟：《進一步拓展澳門經濟發展的空間——兼論澳粵聯合開發橫琴島》，《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4期；陳恩、黃桂良：《橫琴開發：粵澳合作的新模式》，《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1期；李清、俞友康：《關於橫琴開發涉及法律問題探討》，《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2期；陳廣漢：《橫琴開發體制和模式的創新》，《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2期；張漢林：《港珠澳合作開發橫琴模式探討》，《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2期；陳恩、王方方：《橫琴開發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2期。
- ④ 莊金鋒：《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幾點思考》，《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3期；覃成林：《國家發展規劃與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1期；曾忠祿：《關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核心要素的探討》，《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1期；莊金鋒：《加大力度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特區政府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措施及其建議》，《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1期；李凱洛：《快樂經濟，幸福旅遊——關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與路徑》，《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1期；齊冠鈞：《粵澳合力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2期；陳章喜：《“一帶一路”與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2期。
- ⑤ 薛鳳旋、戴荔珠：《由伶仃洋大橋到港珠澳大橋——粵港澳區域合作的成功案例》，《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2期；馮邦彥、彭薇：《港珠澳大橋的興建對澳門經濟的影響》，《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2期；郭楚：《港珠澳大橋建設對澳門的發展機遇——兼論橫琴開發與粵港澳合作》，《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2期；柳智毅：《“大橋經濟”與澳門的發展》，《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2期；何力武、劉驥、官華：《粵港澳競合發展的新趨勢——以港珠澳大橋為例》，《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1期。

國家之間的“橋樑”作用等國際合作問題進行研究。<sup>①</sup>2017年7月1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廣東省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澳門特區政府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在此背景之下，《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發展前景、實施機制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sup>②</sup>如此等等，可見澳門回歸祖國以後，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為實現澳門經濟多元化付出了大量努力，《澳門研究》也在此基礎之上刊登了大量研究成果，進而為特區政府更好地致力於產業結構優化轉型提供了智力支援。

在微觀的相關產業研究方面，經濟多元化的實現最終要體現在產業結構由博彩業“一業獨大”轉向“各行業協調發展”的局面。澳門回歸祖國之前，博彩旅遊業、出口加工業、金融保險業和房產建築業這四大支柱產業共同構成澳門的“準”多元化經濟結構；澳門回歸祖國之後，特區政府在實踐中逐步探索出“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經濟發展路向，並在此過程中大力引導休閒旅遊、會展商務、中醫藥、文化創業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大大拓展了澳門經濟多元化的空間。因此，對經濟多元化問題的研究，直接體現在對澳門經濟體系中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研究上。首先，博彩業作為龍頭產業，長期對於澳門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和影響，特別是2002年“賭權開放”之後，博彩業的“井噴式”發展使得這種作用和影響更加突出。因此，《澳門研究》的作者們一直以來都對博彩業研究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對博彩業的經營管理、客源、現代化轉型、國際經驗、社會影響、社會責任、非博彩多元化等方方面面的問題進行了廣泛、持續的研究。<sup>③</sup>其次，作為博彩業的“副業”，金融保險業、房產建築業也是澳門經濟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澳門研究》的作者們也對金融的定位、貨幣、匯率、股票

① 葉桂平：《淺析澳門經貿服務平台政策對中國與巴西關係之促進》，《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4期；Ana Christina Alves, “Old and New Solidarities: Macau, the PRC and the African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2期；葉桂平：《堅持〈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精神，完善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平台功能》，《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3期；葉桂平：《“橋樑”與“平台”：1995—2002年間巴西與澳門經貿關係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2期；葉桂平：《跨區域合作與國際公共管理視野下的“中葡論壇”》，《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6期。

② 毛艷華、蔡健欣：《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願景與機制創新》，《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第1期；何力武：《粵港澳大灣區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機制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第1期。

③ 關鋒：《從娛樂公司的發展看博彩業對澳門經濟的影響》，《澳門研究》（澳門）1988年創刊號；王五一：《當今世界博彩業的五大趨勢及其對澳門的啟示》，《澳門研究》（澳門）2003年第1期；王五一：《博彩全球化趨勢中澳門博彩業的競爭力問題》，《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1期；王五一：《澳門博彩業大發展中的幾個問題》，《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1期；關紅玲、雷強：《外資進入澳門博彩業帶來的社會政治影響》，《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6期；SO Hang Tai, “The Deficiency of Macau’s Over-reliance Economy on Gaming Industry,” 《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2期；胡根：《澳門博彩業探源》，《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5期；黃雁鴻、余達緯：《中國賭博觀念的演變與現代博彩管理》，《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5期；王五一：《澳門博彩監管的制度瓶頸——美國內華達州的啟示》，《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3期；戴安娜：《澳門博彩業社會責任初探》，《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3期；SO Hang Tai, “The Obstacles for Introduction of Responsible Gambling Policy: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5期；呂開顏、劉丁己：《國際博彩業監管制度對澳門的啟示》，《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4期；蘇一丹、陳小虎、潘樂陶：《澳門博彩業引發的犯罪及其預防》，《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4期；曾忠祿、張冬梅：《內地赴澳民營企業賭客調查》，《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3期；吳崇伯：《澳門博彩業開放帶來的影響與對策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4期；曾忠祿：《澳門與拉斯維加斯博彩產業比較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4期；阮建中、馮家超：《澳門與新加坡博彩業的比較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4期；劉中學、張毅：《內地、香港及台灣三地賭客對澳門博彩業的貢獻測算》，《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4期；周金泉、吳宏哲：《澳門博彩產業之經營戰略》，《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3期；曾忠祿：《澳門博彩公司非博彩多元化發展現狀及必要性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3期；王仁宏：《博彩業應盡企業社會責任嗎？——比較澳門、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企業社會責任關鍵因素與績效表現》，《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3期；周金泉、蘇金福、李少聰、梁釗浩：《澳門博彩企業莊荷職業認同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4期。

等問題，<sup>①</sup>以及房產建築業中房價、市場競爭、發展政策等問題給予了相應的關注。<sup>②</sup>再次，由於對博彩業的過分依賴，澳門經濟的抗風險性和可持續性都十分脆弱，若要改變這種不利局面，則必須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因此，根據澳門社會歷史的實際情況，適度發展休閒旅遊業、會展商務業、中醫藥產業、文化創業產業等新興產業勢在必行。故而，近年來《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對休閒旅遊業的發展現狀、發展前景、發展戰略、遊客屬性、旅遊景點、形象推廣等問題；<sup>③</sup>對會展商務業的發展前景、發展模式、發展路徑等問題；<sup>④</sup>對中醫藥產業、文化創業產業的發展現狀、產業政策等問題，<sup>⑤</sup>都有一定的研究。《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從微觀層面對相關產業展開研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澳門經濟和相關產業的現實狀況，為各產業的科學發展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

### 三、關於澳門政治問題的研究

在《澳門研究》創刊以來所取得的成果中，關於澳門政治問題的研究是僅次於澳門史研究和澳門經濟問題研究的另一個重要課題。如同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門類一樣，關於澳門政治問題的學術研究起步較晚，相關研究大致在20世紀70年代末中葡建交、80年代中葡談判隨着當地華人

- 
- ① 馮少榮：《澳門匯率與貨幣政策初探》，《澳門研究》（澳門）1996年第1期；馮晴：《論澳門離岸金融中心的建立》，《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3期；陳守信：《澳門中央銀行制度的實務運作》，《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6期；陳章喜：《內地與港澳貨幣合作的目標方位：單一貨幣區》，《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1期；鄧達榮：《澳門股票業務發展滯後原因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4期；胡家銘：《港澳貨幣一體化影響與可行性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5期；馮邦彥、王鶴、彭薇：《澳門金融業的戰略定位：中葡商貿合作的金融平台》，《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3期；馬如飛：《聯繫匯率制度下的澳門貨幣供應與通貨膨脹》，《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第4期；王森：《澳門幣與港幣的關係研究——基於商品、金融及實際資本市場的融合程度視角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2期；顧新華、劉念、司徒小丹、林文堅：《在澳門設立人民幣次級離岸中心的可行性》，《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4期。
- ② 阮建中：《澳門房地產業競爭力探析》，《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2期；葉波：《澳門房地產業發展政策建議》，《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4期；楊榮榮：《基於VAR模型的銀行業信貸因素與澳門房價的動態關係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3期；柯慶耀、尤美玲：《澳門房地產發展因素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5期。
- ③ 簡萬寧：《旅遊活動主體比較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6期；李金平、王志石：《澳門松山公園休閒旅遊人數調查》，《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1期；林美珍、鄭向敏：《澳門休閒娛樂旅遊形象的塑造與推廣》，《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2期；彭順生、張鈺莎：《穗港澳三地遊客屬性比較》，《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5期；黃竹君：《澳門旅遊業的現狀、機遇與挑戰》，《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6期。
- ④ 劉競先、姜昆：《從會展業發展支撐體系看澳門會展業發展前景》，《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6期；張濤、梁文慧：《澳門會展業跨越式成長的啟示》，《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1期；陳璟榮：《澳門產業多元化之可行性初探——以會議展覽產業為例》，《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3期；陳青：《澳門會展業發展的空間與方向》，《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3期；王心、葉桂平：《論澳門會展業發展過程中的政府角色》，《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3期；李鐵成：《穗澳會展業協同發展模式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3期。
- ⑤ 黃洲萍：《澳門中醫藥發展現狀及若干策略建議》，《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2期；劉伯龍、龐欣新：《澳門發展文化產業政策探討》，《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4期；熊澄宇：《推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幾點思考》，《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1期；潘威、賀天天：《澳門製藥產業發展環境與策略探析》，《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3期；楊青泉：《創意寫作與澳門文化創意產業》，《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3期；溫憲元：《澳門文化產業：現狀、問題與策略》，《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2期。

越發關注澳門的現狀和未來的政治和社會大背景下才逐步展開的。三十年來，《澳門研究》本着“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的宗旨，緊緊圍繞澳門現實政治的需要，形成了包括“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實踐、澳門政治管理、政治參與、政治發展問題等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實踐研究方面，“一國兩制”作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方案和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制度安排，是統籌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良性運行的“頂層設計”。因此，關於澳門政治問題的研究，首要的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本身及其相關體制機制進行全面考察。關於“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實踐的研究，首先體現在關於“一國兩制”的理論淵源、“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區的具體運行情況以及如何更好地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等具體問題上，楊允中等學者的相關研究尤具代表性；<sup>①</sup>其次體現在關於澳門特區政治體制、中央與澳門特區關係等《澳門基本法》中的相關政治議題上。<sup>②</sup>多年以來，《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對這些宏觀政治層面議題進行了持續而深入的探討，有助於我們全面、準確地認識和理解“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及其法制化體現——《澳門基本法》，事關大是大非，具有極強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在澳門政治管理問題研究方面，“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能否在澳門取得成功，首先取決於澳門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和治理水平。對於澳門的政府治理、政治管理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圍繞在澳門公共行政改革這一議題展開，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澳門政治問題研究的主要構成部分。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有澳門回歸初期對於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改革方向以及改革理念的宏觀探討，<sup>③</sup>以期對公共行政改革的目標和措施形成一個整體性的、綱領性的認識。也有隨着改革的深入對公共行政改革相關子課題展開的微觀研究。例如，為優化公務員體制，展開對薪酬制度、評價考核制度、培訓制度等公務員制度問題的研究；<sup>④</sup>再如，為釐清澳

① 楊允中：《“一國兩制”理論淵源探析》，《澳門研究》（澳門）2003年第2期；楊允中：《“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6期；楊允中：《全面開創“一國兩制”文明——時代的召喚》，《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2期；楊允中：《“一國兩制”的正確實踐與澳門特區的健康發展》，《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6期；楊允中：《提升正確實踐“一國兩制”自覺性，確保澳門特別行政區長治久安》，《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1期。

② 鄭偉：《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權限劃分之探討》，《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4期；王禹：《論港澳基本法中的國家行為和政治問題》，《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5期；楊允中：《立法·立法權·立法體制》，《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6期；鄧益奮：《港澳地區立法會與行政長官的制約配合關係》，《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6期；莊金鋒：《澳門行政主導政制模式研究及完善建議》，《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5期；王長斌：《論澳門行政主導制》，《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3期；蔡永君：《多樣式的威權政體——澳門特區政體分類簡析》，《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3期。

③ 婁勝華：《澳門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芻議》，《澳門研究》（澳門）2003年第1期；何佩珊：《澳門公共行政改革淺議》，《澳門研究》（澳門）2003年第3期；朱妙麗：《“民本”行政改革理念淺議》，《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3期；黃志勇、曾翠儀：《澳門的行政文化路徑選擇》，《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4期；田華、梁曼莊：《組織文化對行政改革的影響：以澳門特區政府為例》，《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1期。

④ 鍾慧璇：《澳門公務員薪酬制度及其改革》，《澳門研究》（澳門）2002年第2期；司徒英豪：《試論澳門公務員福利制度及其改革建議》，《澳門研究》（澳門）2003年第4期；呂國民：《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的工作表現評核制度評議》，《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5期；張海艷：《後現代官僚體系理論與澳門公務員制度》，《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4期；曾軍榮：《澳門公務員培訓政策的演變及發展路向》，《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2期。

門經濟發展中的政府作用因素，展開對公共財政、政府規模等問題的研究；<sup>①</sup>又如，為提高行政效率，展開對電子政府、政府職能等政府工作效率問題的研究；<sup>②</sup>此外，為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展開對政府諮詢等政府決策問題的研究；<sup>③</sup>為加強政府公職人員的廉潔自律，展開對行政監督、行政問責等問題的研究；<sup>④</sup>為合理評估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和治理效果進而改良政府管理，展開對政府績效等問題的研究，<sup>⑤</sup>等等。可見，創刊以來，《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在澳門政治管理問題特別是公共行政改革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大量具有現實導向的成果。這些具有鮮明現實性的個案研究和實證研究，同樣是不可或缺的，無論是對於特區政府的科學決策，還是對於建構宏觀政治問題研究的理論範式，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澳門政治參與問題研究方面，“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能否在澳門取得成功，最終仍取決於全體“澳人”的共同努力和集體智慧。眾所周知，回歸以前，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澳門形成了一種“華洋共處分治”的政治格局，佔澳門社會絕大多數的華人群體並未真正地融入澳葡政府的治理體系中。澳門社會雖然擁有高密度的社團組織，但是其“市民意識”仍然較為薄弱。澳門回歸祖國以後，澳門居民開始當家作主，這意味着全體“澳人”必須增強主人翁意識、強化政治參與意識、提高政治參與水平。因此，強化對於社團、選舉、政治表達等澳門政治參與問題的研究也是理所當然。關於澳門社團問題的研究，既有對於社團本身的歷史沿革和內部結構功能的探索，<sup>⑥</sup>也有對於法團主義治理體制的研究，<sup>⑦</sup>還有對於社團與政府、

- ①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課題組：《澳門政府規模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3期；張毅：《對澳門政府規模的多目標線性規劃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6期；傅桂娥：《澳門政府的最優規模》，《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1期；譚志廣：《析澳門政府公共財政的目標》，《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1期；蔡永君、陳建新：《澳門的政府規模探析——以時間序列和公共行政理論為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3期；陳建新、關淑詩、伍芷蕾：《經濟增長與政府規模的縱向和橫向分析——以澳門為例》，《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1期。
- ② 容凱旋：《澳門電子政府的發展》，《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5期；朱妙麗：《論逆境中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性》，《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6期；戴安娜：《澳門政府行政管理熵增與管理效率遞減探究》，《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2期。
- ③ 黃湛利：《論澳門政府的諮詢機構》，《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2期；毛承潔、郭志勝：《公共政策與政策建議標準初探》，《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5期；謝四德：《有關澳門諮詢制度化的若干思考》，《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2期。
- ④ 鄧木佳：《建構香港高官問責制》，《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4期；劉伯龍：《建設陽光政府——如何在公共政策執行中實現？》，《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1期；婁勝華：《社會變革與特區政府問責制度建設》，《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1期；冷鐵勛：《論政府領導人員特定責任的歸責原則》，《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3期。
- ⑤ 鄭益奮：《澳門公務人員工作表現評核制度解析——基於政府績效的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6期；鄭方輝：《政府績效管理及評價：頂層設計與實踐模式》，《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1期；尚虎平：《政府績效的生成模式及其對澳門的啟示》，《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1期；顏海娜、楊俊文：《美國高級行政官績效考評體系的特點及其對澳門的啟示》，《澳門研究》（澳門）2015年第1期。
- ⑥ 楊仁飛：《澳門社團發展——過去、現狀與展望》，《澳門研究》（澳門）1998年第1期；婁勝華：《澳門社團精英的代際轉換》，《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4期；劉祖雲：《澳門社團政治功能的個案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2期。
- ⑦ 陳震宇：《利益團體政治模式的文化語境》，《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2期；婁勝華：《澳門公民社會的法團主義基質及其新變化——以民間社團為中心的觀察》，《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5期；潘冠瑾：《強社團體制：澳門社團的發展和自治功能的行使（1976—1984年）》，《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5期。

社團與（和諧）社會等社團外部關係的考察。<sup>①</sup>另外，選舉是公民表達政治主張最有效的制度化手段，關於澳門選舉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對立法會選舉選情分析。<sup>②</sup>此外，政治言論的表達、特殊群體的參政行為等主題也是《澳門研究》的作者們關注的重要方面。<sup>③</sup>可見，澳門回歸祖國以後，《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對於澳門居民的政治參與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特別是從政治到社會、從理論到實證對澳門社團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考察，這對於推動澳門社會治理模式研究的深入意義重大。

在澳門政治發展問題研究方面，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變遷，社會關係和社會矛盾也會相應地發生變化，由此導致政治上層建築必要的變革和調整。有關澳門政治發展問題，是指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內採取的政治體制改革方式。相關的研究有對於澳門民主政治發展的內部環境或國際環境的整體探討，<sup>④</sup>也有在面臨2009年及以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政治背景下對政制改革問題、行政長官選舉問題和立法會選舉問題所作出的考察等。<sup>⑤</sup>《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對澳門政治民主化問題所進行的相關研究，一方面反映了澳門社會對經濟民生問題的關注，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在內外部環境的作用下澳門逐步顯現的越來越高的民主化訴求。

#### 四、關於澳門法律問題的研究

法律本地化是根據《澳門基本法》第8條、第11條的規定，將原本適用於澳門的葡萄牙法律

- 
- ① 潘冠瑾：《一種政治社會學視角：從社會資本看“和諧發展論”》，《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3期；梁佳俊：《試論構建澳門的和諧社會——以澳門傳統華人社團為例》，《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1期；潘冠瑾：《實踐的代表——對澳門政治代表模式的討論》，《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5期。
- ② 駱偉建：《從選舉看選民、選舉團體、政府之間的關係》，《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4期；婁勝華：《立法會選制修訂與選舉實踐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4期；李略：《澳門政治格局及其發展趨勢——以得票率變化為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4期；陳建新、陳慧丹：《直選議員的參選政綱與選後表現——以社會福利議題為例》，《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4期；蔡永君、何偉鴻：《政治精英利益與選民投票意向的博弈——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組別性質為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4期；婁勝華：《2016年修訂的立法會選制與第六屆立法會選舉實踐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4期；陳懷林、李小勤：《新媒體衝擊波下的澳門立法會選舉：數據與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4期；牟效波：《澳門立法會選舉中選票自拍禁令的合憲性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4期；蔡永君、何偉鴻：《候選組別背景與區域得票之分析——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區域性得票為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4期；庄真真：《從立法會直選結果看澳門政治生態變化——以2009至2017年三屆立法會直接選舉結果為研究對象》，《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4期。
- ③ 李焯輝：《論兩性參政行為的差異》，《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3期；蘇常、張印平：《“澳門講場”——電波構建的公共領域》，《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3期；潘冠瑾：《澳門青年參政意識的現狀及其改進方向》，《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4期。
- ④ 林媛：《關於港澳特區政治發展中的衝突與和諧》，《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5期；肖剛：《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發展的國際環境》，《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5期；宋鎮照：《澳門特區政治發展的挑戰與機遇：一個台灣學者的觀點》，《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5期。
- ⑤ 楊仁飛：《關於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先行香港之提議的一些看法》，《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6期；陳章喜、陳紹方：《澳門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及其社會政治發展趨向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6期；婁勝華：《立法會間接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果及其改進思路》，《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2期；江華、庄真真：《論立法會間接選舉制度的合理性》，《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2期；劉焯華：《完善民主制度 構建發展共識——近期澳門政制改革評述》，《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2期；李略：《政制發展方案諮詢文本調查報告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2年第2期。

等，按照一定的立法程序，逐步進行清理、分類、修訂、翻譯和過戶，進而轉化成澳門本地法律並實現司法人員本地化的工作，是過渡時期澳門社會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澳門回歸祖國之後，隨着澳門經濟、政治與社會的高速發展，社會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公民的政治法律意識不斷增強，業已本地化的澳門法律仍需要進一步改革以真正適應深層次的社會發展需求。因此，關於法律問題的研究一直是、也特別是回歸以後澳門社會必須重視的課題。《澳門研究》的作者們一直深耕於這一領域，並在宏觀的澳門法制研究、澳門法律相關部門研究（如《澳門基本法》、刑法、民法、商法、行政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等）、中國內地與港澳台法律比較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

在宏觀的澳門法制建設研究方面，無論是回歸之前實現澳門原有法律本地化，還是回歸之後將本地化了的法律進行深化改革，都需要對澳門相關的法學理論、法制的發展理念、發展道路和發展前景等問題進行宏觀的考察，以此對澳門本土法律體系的構建和法律改革工作進行統籌和指引。其中，有對於相關法學理論的研究，<sup>①</sup>有對於法律本地化的研究，<sup>②</sup>有對於澳門法制史的回顧，<sup>③</sup>也有對澳門法律發展前景的展望。<sup>④</sup>這些研究為數不多，但不可或缺，從宏觀層面折射出學者們一直以來對澳門法制建設的關注。

在澳門法律相關部門研究方面，澳門法律本地化的最終任務，在於建立起真正適應澳門社會發展需要和澳門居民現實需求的法律體系，這就要求對澳門法律體系各部門的理論與現實進行深入考察。在《澳門基本法》研究方面，作為“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在澳門法制化的體現和澳門特區的憲制基礎之一，《澳門基本法》在澳門法律體系中無疑地位崇高，相關研究成果集中在《澳門基本法》對澳門法治建設、“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澳門基本法》的關係、《澳門基本法》第23條立法問題等方面。<sup>⑤</sup>在澳門刑法研究方面，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大陸法系刑法理論、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刑事立法和刑事個罪（如毒品犯罪、電腦犯罪、詐騙罪、勒索罪、洗黑錢犯

- 
- ① 李寒霖：《“惡法非法”與“惡法亦法”辨析》，《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1期；簡萬寧：《以法的價值判斷澳門現行司法體制存在的問題》，《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2期；陳轅：《對澳門法律文化的一點思考》，《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5期。
  - ② 黃進：《澳門法律本地化之我見》，《澳門研究》（澳門）1998年第3期；邱庭彪：《澳門法律改革本地化進程與趨勢》，《澳門研究》（澳門）2014年第1期。
  - ③ 何志輝：《全球史觀與澳門法律史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3期；何志輝：《澳門法制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歷史卷〉前言》，《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1期；趙國強：《澳門回歸十年刑事立法的回顧與展望》，《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2期。
  - ④ 趙國強：《澳門法律之發展與展望》，《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1期；范劍虹：《澳門法治發展之路》，《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3期。
  - ⑤ 陳欣欣、鄧子傑：《從港澳特區基本法23條立法看社會的極化與整合》，《澳門研究》（澳門）2003年第3期；楊允中：《正確認識基本法，提升“一國兩制”意識》，《澳門研究》（澳門）2003年第4期；李燕萍：《淺談〈澳門基本法〉對澳門法治發展的意義》，《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5期；龍錦練：《淺談〈基本法〉第23條立法》，《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6期；林桂桁：《淺論〈澳門基本法〉第23條立法》，《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6期。



罪、博彩犯罪等)等方面,<sup>①</sup>這些研究體現了《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對近年來澳門刑事法律改革從理論創新到現實個案等各個方面的廣泛關注。在澳門民法研究方面,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對物權、債權、侵權歸責、知識產權、婚姻家庭等民事問題的關注上;<sup>②</sup>在澳門商法研究方面,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對商法改革、市場競爭、預算立法、公司法等問題的關注上。<sup>③</sup>關於澳門民法、商法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其中又多從具體個案、部門或行業切入,這說明澳門民商法研究具有鮮明的現實導向性。在澳門行政法研究方面,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對行政法規的性質、地位和位階這一爭議問題的探討上,<sup>④</sup>這一問題表面看似是對法理問題的爭論,實質上是對《澳門基本法》中關於行政長官地位問題,以及行政與立法關係這一政治體制問題的爭論,既是一個法律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在澳門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研究方面,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民事訴訟、刑事訴訟、仲裁等因訴訟和非訴訟活動而產生的各種社會關係的調節問題上,其

- ① 趙國強：《論澳門反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之立法價值導向》，《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2期；廖志聰：《以輔助手段實施的電腦犯罪行為》，《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4期；賴建國：《羈押措施之務實決定——本澳司法實務若干罪名考察》，《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6期；趙國強：《澳門刑法中法人犯罪之立法現狀及其評析》，《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4期；陳軒志：《從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看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司法管轄權》，《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4期；趙國強：《論澳門刑法的理論本源——以大陸法系刑法理論為視角》，《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1期；焦艷鵬：《法益理論的價值考量與適用維度的擴展》，《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1期；廖志漢：《澳門保密制度的刑事立法構想》，《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1期；潘星丞：《詐騙罪與勒索罪的界限》，《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1期；劉國熙：《兩岸四地的反洗錢法律制度及其發展趨勢》，《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1期；[美]亨利·方泉、[美]吉伯特：《博彩業與犯罪：中國在澳門的期待與風險》，汪誠芳譯，《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1期；趙秉志、黃曉亮：《論內地與澳門刑事司法互助機制的構建》，《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1期；陳雷、王君祥：《論海峽兩岸司法互助機制——從〈金門協議〉到〈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和司法互助協議〉》，《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1期。
- ② 米萬英：《澳門物權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3年第2期；簡萬寧：《試論醫療事故民事責任之歸責原則——對澳門醫療事故責任歸責法的思考》，《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3期；唐曉晴：《論要物合同》，《澳門研究》（澳門）2005年第3期；鄭錦耀、林浩威：《論〈澳門民法典〉中買賣預約合同與物權變動的關係》，《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6期；陳華強：《交通事故及相關法律責任》，《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1期；鄧達榮：《澳門專利保護——兼論藥品專利及其註冊現況》，《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4期；譚桂珍、蘇丹：《論澳門婚姻登記制度》，《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4期；陳卓琦：《論澳門一般合同條款制度》，《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2期；楊洋：《澳門物權之佔有制度》，《澳門研究》（澳門）2009年第2期。
- ③ 鄧達榮：《論澳門競爭法律制度及其政府決策》，《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6期；邱琦：《〈澳門商法典〉中的公司合併制度解析》，《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4期；艾林芝：《房地產預售制度的比較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3期；汪清揚：《全球化背景下澳門商法改革之路》，《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2期；張富強、李夢露：《澳門預算立法的沿革、問題及方向》，《澳門研究》（澳門）2016年第3期。
- ④ 駱偉建：《論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規的性質和地位》，《澳門研究》（澳門）2002年第2期；王禹：《論行政法規的性質和地位》，《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6期；鄭錦耀：《行政法規的性質、位階與違憲審查權——兼回應王禹教授的觀點》，《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3期；王禹：《行政法規的性質、位階和違憲審查權——對鄭錦耀先生批評的回覆》，《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6期；鄭錦耀：《〈關於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草案淺析》，《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6期。

中既包括法理層面的思考，也有現實操作層面的研究，<sup>①</sup>開展對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的研究，為澳門司法機關和執法部門在公正司法、嚴格執法程序、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過程中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借鑑和指導。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澳門研究》的作者們對澳門法律體系各部門進行了有重點、有深度、有現實關懷的研究，這些研究對於推動澳門法律改革工作向縱深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內地與港澳台法律比較研究方面，此類研究是基於澳門特殊的區位、對澳門內部各部門法律問題所進行的空間拓展。隨着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和1997、1999年港澳相繼回歸祖國，以及兩岸關係發生新變化，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聯繫日趨緊密。由於歷史原因，中國內地、香港特區、澳門特區、台灣地區分別有各自特殊的法律制度，使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和台灣的法律為一國、兩制、不同法系和法域的情況。因此，必須對中國內地與港澳台法律進行比較研究，以正確理解這些法律差異，並探索出解決或規避由於法律差異所導致的法律衝突的有效途徑。毫無疑問，澳門與中國內地的聯繫尤為緊密，加之二者的法律體系相似，所以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中國內地法律與澳門法律的比較研究。例如，關於中國內地與澳門特區在立法法、違憲等憲法及憲法相關法問題方面的比較研究；<sup>②</sup>又如，關於中國內地與澳門特區在刑法問題方面的比較研究；<sup>③</sup>再如，關於中國內地與澳門特區在公司法、稅法、環境法等商法、經濟法問題方面的比較研究。<sup>④</sup>創刊以來，特別是澳門回歸祖國以後，展開對中國內地與港澳台法律的比較研究既符合實際需要，也具有前瞻性的歷史意義。這一導向所形成的相關研究對於澳門居民認識中國內地與澳門的法律差異、澳門相關立法機構的立法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 結語

澳門史、澳門經濟問題、澳門政治問題、澳門法律問題，是《澳門研究》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除此之外，《澳門研究》在文學、教育、社會、宗教、哲學等等學科

- ① 李磊明：《析兩類管轄權衝突：以內地法院與港澳法院商事案件管轄權的關係為中心》，《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3期；葉青：《逮捕、拘留附帶搜查制度比較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4年第5期；鄭錦耀：《關於中級法院裁判值得商榷之處的若干思考》，《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5期；應堅、范劍虹：《澳門仲裁裁決異議的立法比較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6年第5期；林浩威：《論判決之既判力問題》，《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3期；賴建國：《澳門現行羈押問題再探討——兼評學說的引用》，《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6期；姜燕、蘇建峰：《小費爭議與終審法院裁決》，《澳門研究》（澳門）2008年第2期；趙琳琳：《澳門刑事特別程序之重構》，《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1期；李哲：《澳門刑事特別程序改革之路徑分析——以大陸法系發展趨勢為基礎》，《澳門研究》（澳門）2013年第1期。
- ② 駱偉建：《論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法的幾個問題——與國內立法法的比較分析》，《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2期；王曉波：《澳門違憲審查之雙重機制及其對內地的啟示》，《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4期。
- ③ 葉青：《澳門與中國內地刑事強制措施制度比較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2年第1期；趙國強：《中國內地與澳門刑法總則之比較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02年第1期。
- ④ 范劍虹、陳捷：《兩岸三地有限責任公司立法比較概略（上）》，《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1期；范劍虹、陳捷：《兩岸三地股份公司立法比較概略（下）》，《澳門研究》（澳門）2007年第2期；謝偉：《澳門與內地環境法律制度比較研究》，《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1期；張富強、劉中原：《內地與澳門企業所得稅法比較》，《澳門研究》（澳門）2017年第1期。

領域也取得了豐碩成果，在此只能作出重點分析，而不可能面面俱到。通過對三十年以來《澳門研究》在澳門史、澳門經濟問題、澳門政治問題、澳門法律問題方面成果的梳理與述評，對於瞭解《澳門研究》在推動澳門學術發展的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績、對於從一個側面瞭解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的整體特徵和發展歷程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首先，《澳門研究》對於建立完整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澳門研究》涉獵廣泛，所刊登的研究範圍幾乎涵蓋了歷史、經濟、政治、法律、社會、文學、藝術、宗教、哲學、教育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所有領域，有時甚至涉及城市規劃等方面。不僅如此，在上文所述評的歷史、經濟、政治、法律四大主要領域中，各領域內的專題研究也十分豐富，這對於深化某一學科的發展必不可少，這些成效共同構成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建立和健全。

其次，《澳門研究》對於促進澳門與海內外學者的交流共進，發揮了重要作用。《澳門研究》一方面吸引了一批澳門本土學者致力於澳門問題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意識到澳門問題研究所需要的國際視野，匯聚了一批從事澳門問題研究的中國內地、澳門、香港、台灣地區、葡萄牙、日本等地的學者。開放性與國際性符合澳門自開埠綿延至今的歷史和現實特質，同時也符合學術交流和爭鳴的客觀規律，這對於促進澳門本土學術的深度發展極為重要。

最後，《澳門研究》對於鎖定澳門學術的風格與特色起了關鍵作用。《澳門研究》在創刊之初的定位就是“研究澳門，服務社會”，在此已經顯露出鮮明的現實導向性。從上文對《澳門研究》在澳門史、澳門經濟問題、澳門政治問題、澳門法律問題等方面成果的梳理與述評，可以發現，經濟之於現實經濟狀況、政法之於現實政治狀況都有着緊密的互動關係。即便是關於澳門史的研究，也指向建構一部較為完善的澳門通史、旨在增強其歸屬感的宏觀現實目的。

總而言之，在澳門學術發展史上，抑或在構建澳門本土知識和話語體系的歷史過程之中，《澳門研究》無疑均是難以繞開的關鍵角色。這些年來，澳門學術在發展的同時，仍然存在諸如過於實證化、缺乏理論創新等問題。<sup>①</sup>這些問題雖然會影響澳門學術的深入發展，但並不能因此而否定澳門學術發展至今所取得的巨大成績。這些問題的解決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它們在發展中產生，也最終需要在發展的過程中克服。

[責任編輯 陳超敏]

<sup>①</sup> 相關論述詳見鄧正來：《深度研究與自主發展——尋求社會科學研究在澳門的深度發展》，《澳門研究》（澳門）1997年第2期。